

入緬隨軍前後

(續)

樂恕人

在緬甸戰局大逆轉之前，我國爲了增強兵力，又續派第六十軍(?)張軫部隊全軍入緬助戰，孫立人部即爲其中一師；另還有一師最後到達的悍將劉伯龍師，駐守曼德勒重鎮，張軫的軍部也就設在同一的瓦城。

在我短短的一個多月中，我始終在正面前後方奔馳着，所採訪的事件和訪問的人物，包括會晤杜副司令長官，戴安瀾師長，廖耀湘師長及其部隊。在後方會見了新被任命爲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的羅卓英上將，第六軍軍長甘麗初中將，滇緬鐵道總辦曾養甫先生，奉命入緬聯絡緬甸政治人物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先生，軍事委員會駐緬甸代表侯騰(飛霞，數年前已在臺北去世)少將等。

可是我在前方時漏了一條重大新聞，因爲蔣委員長偕夫人突然秘密地到了緬甸，四月八日在梅苗舉行了中英軍事會議；九日由杜將軍等陪同前往瓦城視察。等我聞訊趕去時，蔣委員長已飛返重慶，僅由官方發佈簡訊一則，略謂：

「舉世欽仰之蔣介石將軍，於日前偕夫人來

緬巡視，曾至梅苗與英方將領會晤，並觀察曼德勒，現已公畢飛返重慶。」云云。我只能訪問得些消息，準備日後寫書報道之用。

四月二十一日，我從臘戍等到了中央社來緬隨軍記者李絨三俞劍碩二兄，共同隨着增援部隊前去曼德勒，訪問張軫軍長和劉伯龍師長，適逢敵機大丟燒夷彈，和緬甸人放火焚城之後，我們得見瓦城大火後的慘烈鏡頭。當時緬甸從政界到民衆，都受了日本人的煽惑，要乘機趕走英國人，爭取獨立。因之，對中國派兵入緬助戰，認爲是協助英國，阻撓緬甸獨立，牽恨之餘，亦以中國軍隊爲敵。所以中國遠征軍在緬作戰不像在國內，當地民衆是我們作戰的阻礙，更談不上軍民合作了。

我們三位中國記者去到瓦城時，已知左翼正遭受敵軍第十八師團的猛烈進犯，但就連張軫軍長和劉伯龍師長也不太明瞭戰況的發展，大家焦灼不安。他們二人畢竟是久經戰陣的老將，態度仍然沉着，同時並告訴我們正面敵軍距瓦城尚有九十哩，右翼無何變化。我們在幾名槍兵的保護

下到城內外攝影採訪，又遇上敵機轟炸，躲在溝渠裏，弄得一身塵土。我們的軍部師部，四週日夜有緬甸人放火，張軫軍長捉到他們後不忍傷害，曉諭之後，又釋放了他們。

二十二日，軍情混亂，左翼吃緊，敵軍正猛攻重要據點棠杏城，第六軍的某師損失頗大。而正面右翼的敵軍也繼續向北進犯，但戰況還穩定，不如左翼之激烈而危險。我們三人隨劉伯龍師長外出視察地形，並遊覽緬甸故宮，劉師長告訴我們，他已奉命死守瓦城，北部山頭正構築砲兵陣地，我們登山一望，但見瓦城真已成爲一片瓦礫，而郊區內外，火光此起彼滅，我們互相感到有如當年拿破崙遠征到了莫斯科，縱目緬甸河山，不禁爲之憤惜。

二十三日正午，軍師部已得確息，左翼棠杏失守，正面第二百師，戴安瀾部正奉命反攻，司令長官羅卓英和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美將史迪威已趕去指揮第二百師反攻。

我們急於想趕去左翼棠杏，張劉二將軍則加勸阻，說是左翼目前極爲混亂，棠杏是否能夠反

攻下來，還不知道；且左翼綿互一千哩，其他地區也有戰事。上緬甸高原山野，路徑如蛛網，沿途緬奸出沒，不隨部隊，我們三個文人，如何去得？一番話說得我們啞口無言，只好坐守瓦城，且看保衛戰必有緊張精彩的場面。

誰知，狡猾的敵軍，早就避免圍攻瓦城，和中國遠征軍主力決戰；而却突襲左翼。突破棠杏以後，一面應付中國軍隊的反攻，一面急以快速部隊，穿越我軍並無縱深配備的上緬甸高原地帶，直趨盟軍在緬後防重鎮臘戍。

英國皇家空軍和中國空軍美志願隊奉命前往阻截沿山間公路突竄的敵軍騎兵和裝甲部隊，但效力甚微。二十五日臘戍告急，張軫軍長奉命趕回臘戍坐鎮，民間和軍方後勤部隊已開始撤退，車輛如流水般湧向中緬邊境晚町。

二十五日夜半劉伯龍部奉命從瓦城回援臘戍，因為敵軍已快寬抵臘戍郊外，而國內援軍未到，臘戍防務空虛，只好就近抽調本來扼守瓦城的劉部，回師赴難。

這時，我們三個記者，臨到進退關頭。劉師長力主我們隨他退守臘戍，幸好臘戍得保，我們尚可捲土重臨前方任何地區；如果臘戍萬一有失，緬甸戰局大勢去矣，我們留緬何用？

我和俞創碩兄同意劉師長勸告，隨他部隊趕回去搶救臘戍，採訪保衛後防重鎮的一戰。而李誠三兄則以為他剛到緬甸前方，尚無戰訊報道。如果臘戍有失，豈不立即退回國內，如何對得起中央社派遣他去緬的任務？所以他決定隨軍方一隊運輸車前往瓦城正前方三十哩皎西去訪羅卓英司令長官部，他說要退也隨羅將軍退却。羅

將軍是四月初旬入緬就職，代替衛立煌將軍職務的。

我們三人在那晚分道揚鑣，我和俞兄隨劉師退守臘戍沿途緊張萬分，準備隨時可能爆發的遭遇戰；因為傳說敵軍已經衝到了梅苗，而我們又非通過梅苗不可。幸好平安抵達臘戍，戰鬥部隊急馳郊外迎敵，展開激戰。二十七日我乘機去看參謀團林團長和張軫軍長，但見參謀團已整裝待「退」；軍部却指揮從國內趕調的另一師的一部，趕築臘戍郊內外防禦工事。臘戍市街竟至在二三天之內，撤退成空城一座，與前些日子的繁華對照，轉瞬滿目淒涼。

林團長和侯騰代表勸我特別小心，臘戍命運異常危急了。在街頭，我遇一輛小汽車迎面而來，至我面前停下，原來是王芃生先生和他主持的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駐緬代表劉達人，他們勸我上車一同退回滇邊。我婉謝他們的好意，但尚未到最後關頭，不能隨他們先走。

敵機分批前去空襲臘戍市區，郊外戰事不利，我軍着着退到市區，二十八日上午天未黎明，已聞清晰炮聲，市區又有緬奸縱火，情況混亂萬分，參謀團、英國皇家空軍、軍部戰鬥部隊在倉皇中駕車退向中緬邊界！

我和俞兄也非戰鬥人員，被令上車撤退。二十八日天色未明前，在連續砲聲和火光沖天中，隨着軍部車輛撤離了緬甸最後重鎮——臘戍。上午十時許，軍車絡繹，駛進中緬邊界的晚町鎮，難民聚集，軍人遍地，一幅敗退圖，真令人難過；再看牆上街頭，歡送遠征軍預祝凱旋的標語尚未褪色，遠征軍竟不旋踵而敗而退，心中更覺非常

傷感。

二十九日敵軍就寬據臘戍，便乘勝分兵兩路，一面沿滇緬公路進擊我向國內敗退的國軍，一面即分兵向西北竄犯另外二處重鎮八莫和密支那。敵人得到意外奇襲的勝利，果然收到巨大的戰果。其竄進滇西的部隊，且一度越過怒江，幾乎乘虛奪下重鎮保山。後為我軍驅返怒江西岸，形成長期對峙的戰局。但滇西的戰火，已使昆明告急，重慶震動；敵人在國內興高采烈之餘，更狂妄地叫出乘機結束「支那事件」，以為可以進攻昆明，威脅重慶，迫使中國投降。

其在緬北的橫掃千里，果然截斷了我遠征軍主力的第五軍的退路，演成翻越野人山，全軍覆沒，戴安瀾師長陣亡的慘痛損失。

自第五軍在二月中旬浩蕩入緬，三月中旬與敵軍在緬南同古接觸以來，到四月二十九日敵軍佔據臘戍為止，為時不過月餘的戰事，竟至慘敗如此之速，如是之烈，殊非盟軍當局，特別是中國最高統帥所料及逆睹者！

我隨入緬非戰鬥部隊及難民，在上有敵機，下有進兵的狼狽情況下，循來時的滇緬公路退回昆明。時為五月上旬。昆明人心惶惶，許多外省人已準備離開，本地人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記得昆明告急期中，一次黨政軍聯合紀念週上，雲南省主席、滇黔綏靖主任龍雲將軍出席報告時局，省黨部內外由龍的法式裝備的警衛隊戒備周密，聽衆人山人海。我已得機前去聽他作何表示。

那位年在半百，而貌不驚人的雲南王，身著長袍馬褂，像一位教書先生，用他那一口濃厚的

昆明官話大意說：

雲南境內的軍民，務必安心，中央和他本人絕對有把握安定滇西的戰局，從怒江東岸起，絕不讓敵人再越雷池一步。而且還得準備反攻，把敵人趕出國境，收復怒江以西的失地。

他說話的時候，到顯出極爲具有魄力和自信。但說完了上面一段，他却輕鬆了幾句道：

如果外省籍人士，覺得昆明不安全，要離開的就請便，他也絕不挽留。

五月中旬，滇西戰局穩定下去，敵我兩軍隔怒江對峙，僅時有稀疏砲戰，相互漫不過像天塹似的怒江。

我經昆明飛返重慶，除了老朋友們到機場去接我後，第一個去見的人當然是趙敏恆先生。我當時表示工作失敗，有負他的期望，極爲慚愧，而他却安然微笑說，盟軍慘敗，國軍慘敗，我的採訪那能成功，要我不必介意。

而我和路透社的關係，原係約定以駐緬隨中國遠征軍爲定，到那時自然告一結束。從二月中到五月中，我只爲路透社工作了三個月，在我個人的工作經歷上，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月在世界第一流的路透社工作，但藉那次機會，我得親見中國大軍入緬遠征的場面，歷史的一頁，我親身歷之，且爲文著書問世，亦足以自慰自豪。

原來，辭去路透社時，我就向趙先生表示，在緬因通訊萬分困難，報道太少，而我所見所聞甚多，極願另撰專書一冊，以彌補電報通訊的不足，使世人認識緬戰有關的一切情形，且爲歷史留下真實的痕迹，趙先生甚爲同意，且鼓勵我從速進行。

當時重慶漸趨炎熱，而且霧季已過，敵機空襲又已開始，我遂同友好商量，結果回南溫泉母校去會晤張道藩和馬星野二師，要求給我一個住處，從事緬戰的著述工作。後來得二師之助，允我在花灘溪畔的春風樓——本是一部教職員的休息室和餐廳——的二樓上，佔一室專用。我於是摒擋一切，從重慶市區遷到花灘之畔，開始動筆，寫我那本名爲「緬甸隨軍紀實」的專書。

還遠在我回南溫泉寫作前，應該是剛回重慶後不久，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先生——我在政校與中央宣傳部合辦的新聞事業專修班受訓一年時，他是主任，政校新聞系主任馬星野先生是副主任——特別約我去談了一次話。潘先生告訴我隨軍回國內後，不論寫文章或講演，有兩點要注意：一爲不要過於嚴評盟邦英國的對緬軍政事宜，適可而止。一爲軍事機密要特別斟酌，不要暴露過大過多。潘先生是我師長，亦爲新聞記者，我對他的忠告自然表示尊重。所以後來有許多地方請我去講演，我都婉謝。僅在過昆明時，去西南聯大（即戰時中，由北平的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合組的大學），回重慶後在政校（當年爲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後改爲國立政治大學，現已在臺北復校），以及在重慶中央廣播電臺對全國播講過一次。我當時即會斷言：抗戰如一顆千年古松，緬西的暴風雨，只能吹得它枝葉飄動，絕對不會把它連根拔起的。

專書寫成之後，又如約交給潘公展、馬星野和趙敏恆三位校閱一次，他們認爲內容甚好，亦無違禁等情，不必再交審查機構，逕由潘先生和戰時的重慶圖書雜誌審查處聯絡，而由中宣部附

屬的勝利出版社印行。該社的主持人是印維廉先生，出版書籍主要是對中央國爭的，文藝性質者較少。我當時尚在青年，只求書能出版，志在圖名，不在圖利。所以事前亦未爭取條件，要求版權稿費等等，因爲潘先生的關係，一概不問，由他們決定即可。

那知拖到九月，一本八萬字上下的小書才嫻嫻出來。而且紙張印刷之壞，大出我的意料。本來在抗戰期間，後方出版物的條件盡談不上，可是我那本「處男作」——說句笑話，我那書名符其實爲處男作，從二十歲開始做記者，五年後出版是書，第一冊書是也；又因我那時行年二十有五，生平尚「不一色」，是真處男也——到爲印先生主持的勝利出版社以最壞紙張和印刷出之，我當年大爲不滿，及今猶有遺憾。該社曾贈送我一筆稿酬，已忘其數之多少。僅在領得後邀請我好十餘人，在兩路口湖南菜館園大吃一頓酒席以資慶祝，事後稿費即所餘無幾了。

我至今猶珍藏一冊，真正「敝帚自珍」，這次草此文時，重行檢出參閱，覺得外表雖壞，而內容尚屬不惡。我這本「緬甸隨軍紀實」，在當年是唯一一本報道中國入緬遠征的專書，自信甚有歷史價值。

就寫作而論，有一事願附筆一談。

我的書出版以後，某日，一位還在政校唸新聞的後期同學告訴我，經緯月刊上登載了一篇卜少夫寫的「文學修養與新聞寫作」，曾抄錄我的書中一段：「仁安羌搶救英緬軍」和大公報范長江的一段「徐州撤退」。我那時和少夫兄尚無一面之雅，他那時從戰區轉來後方，初任重慶中央

日報採訪主任，繼昇副總編輯，在新聞界已有相當名氣。我急忙買來一看，頗有受寵若驚之感。因為他的大作上，力言新聞寫作與文學修養關係之重要，他在大肆伸論之後，遍引歐美幾個名記者名著中一二段為例；而中國記者，他只引用了當年大公報特派員現已附匪的范長江所寫的「徐州撤退」一文中的某一段；另外則引用我那本書中描寫孫立人部隊在仁安羌油田搶救七千英緬軍隊的戰況。

爲了作成紀念追憶，且看少夫兄所引用我的報道：

「中國軍隊跟蹤追擊，很多樹林上正滴着鮮血，敵人的屍體還在樹上，連人帶機關槍都縛得緊緊的；士兵們很多爬到樹上去得到了戰利品。」

「英緬軍隊營救出來了，那麼幾千人，全歡聲雷動。他們感激中國軍隊到了發狂的程度。有的把軍帽都扔到了天空，有的却上來和中國士兵握手，擁抱。「哈囉」的呼聲，頓時充滿了整個油田。」

「英緬軍隊被敵人包圍兩天了，那樣炎熱的天氣，沒有水喝，連汽車裏面的水箱，都打開來利用了。中國軍隊把水裏的飲水給他們解渴，士兵中間流露着一片親愛的情誼。」

過了幾個月，我才認識了少夫兄，以迄於今，彼此隔海同爲「新聞天地」的事業而艱苦奮鬥。可是我們今天公私意趣，大不相同，即以健康而論，他二十幾年來似乎從不生大病，雖烟酒風流，年逾五十，而頭髮既不禿又不白。而我呢，年未半百，已彷彿韓文公寫祭十二郎文時的心情，大有未老先衰之概。又兼宿疾一發再發，至今養

荷異國山野，想起這位從神交到稔交的老友，精神百倍，幹勁十足，真使我自愧弗如，羨煞人也。再回頭話說中國當年入緬甸遠征慘敗，其源原本在我書中有個交待，此文不暇再贅。祇是大撤退慘況在戰史上罕見罕聞中，有一事未爲我書中提到，今天在此大值一提起者，是爲：當入緬甸軍因後路爲敵人截斷，在前方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時，杜聿明和孫立人兩將軍爲了撤退計劃，曾發生激烈爭執且演成他們二人之間的怨懟，直到戰後在東北剿共時，杜孫又以不和聞。但當孫立人率部不遂杜計劃，而護羅卓英司令長官及史迪威參謀長自緬甸中部逕趨印度時，全師未受絲毫損失，進入印度後，英國軍政方面曾想來一個有禮貌的「繳械」。但孫將軍大爲震怒，立即把全師展開，請英方前來「檢閱」。英國軍政人員一看孫師部隊，裝備齊全，精神抖擻，好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當時嚇退回去，再也不敢提請中國軍隊把武器存放印度之類的無理要求。孫師爲國家保留一師元氣，且爲中國軍人又多爭一件光榮史實。至於杜聿明的第五軍，因爲想反攻緬北失敗，無路可退，結果翻越中印緬未定界的野人山，又慘逢雨季，全軍傷亡病歿大半，戴師長陣亡，杜亦臥病入印，爲國不但無功，實有大過。

事後回憶檢討起來，我那次隨軍工作的失敗處，主要還不是當時報道太少，因爲那是限於環境的事情，所有盟國隨軍記者全都一樣；而是始終在正面進退，未能冒險犯難，抽出時間趕付左翼，特別是中緬泰邊境的湄公河上游去採訪。即不論新聞報道，單就旅行來說，像那種風光奇異

之區，一生中未必有一二次機會前往。

其次是那晚從曼德勒撤退決定何去何從時，我應該和李誠三兄採取同樣行動，前往長官部與羅卓英將軍同行，而不應隨劉伯龍師趕回臘戍，以致失去退入印度的機會。所以我返返重慶不久，聽說李誠三兄到了加爾各答，不禁大爲後悔，又不禁大爲羨慕，一時感慨叢生，詩興大來，曾經吟過一首舊體七言絕句道：

「萬里鵬飛願已輸，悔教戰馬踏歸途。臨風仔細思量久，膽識全無愧丈夫！」

那時我常常做新詩，一年難得做一二首舊詩，而且對舊詩只讀過一本唐詩三百首，幸而這首詩，二十幾年後的今日，在學詩略有門徑時看來，居然既合七虞韻，又未錯平仄，真可謂神來之筆了。在我那本「緬甸隨軍紀實」書中第四十一章，也就是結論的最後兩段，我會經很情感衝動地寫道：

「我們檢討緬甸的戰事，有一句話可以概括地道出了同盟軍失利的原由，讓我們嘆息一句：『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但是，緬甸戰事的失利，祇是民主國家反侵略戰爭中的一個小頓挫。我們必須規復緬甸，我們也有可能規復緬甸，如果同盟軍改善了合作而又加強了自信和決心的話。」

「於今，我站立在揚子江上游的山城上，遙望着緬甸，白深的佛塔，是不是還依然無恙呢？伊洛瓦底江的流水，是不是還在平靜地流着呢？炎熱荒蕪的草原田野，飄逸秀美的傣族姑娘，乃至兩頭黃牛拖的木輪車，一片葉子捲成的緬甸菸，我都懷念着，我們什麼時候再會呢？」

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一九四四年中國駐印軍——也就是一九四三年慘敗後退進印度，重加補充，完全美式裝備的新軍——反攻緬甸，大獲全勝期中，我再度入緬隨軍十月，上面書中未段所懷念着的一切，我都重逢再會了，真正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尤其是在舊戰場上痛殲舊寇仇，雪恥濼辱，國家個人，永不能忘！今後有機會，再來紀述第二次入緬反攻的隨軍採訪。

走筆至此，我不能不藉此一文，來表示我對趙敏恆先生的哀悼之忱。原來他早幹膩了英國路透社中國方面的經理一職，十幾年為它花精力，費心血，身為中國人，總不能終身為英國服務？雖然在路透社期中，他也曾利用它為中國盡了不少宣傳的力量。抗戰末期，他曾用中文寫過一本「採訪十五年」，他覺得中文還能寫，的確也還大有可取。抗戰末年，成舍我、程滄波二先生在重慶恢復出版世界日報，就由趙先生辭去路透社，出任該報總編輯。我那年去歐洲，他們三位還央我兼任世界日報駐歐洲特派員的兼職。

抗戰勝利後，趙先生回到上海；出任新聞報的總編輯，社長正是程滄波先生。一九四七年我從美國回南京擔任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到上海時總要去看他，談天談地。

一九四八年年底，京滬疏散，我辭去中央日報職務，未能同去臺北，却携帶着決心要結婚的情侶和兩位老友的家眷子女，經上海乘船前往廣州。最後離開上海前，我們大家同去拜辭趙先生伉儷，出時催他應變，設法離滬。出乎我意料，他態度極為安詳，說是他要留下來看看，再定行止。我當時大為驚異，力勸他說，共產黨奪取京

滬，迫在眉睫，此時不走，以後難行！共黨豈能放過一個人物如他的？可是他還是沉着不表示要離開。後來中共去後，趙先生當然是黑名單上要人。逮捕之後，初則利用他收錄英美英文廣播，尚無加害之意。繼則在三反五反中，把他送進勞動改造營。五年前據說已在江西集中營內不堪

折磨，早已去世。今日回憶往事，想念起趙先生之精明能幹，頭腦之清晰銳敏，不知何以對中共發生幻想，以致在困頓勞役之中，提前結束了他燦爛的生命！而且還是一個最悲慘的結局！但不

(完)

編後記

編者

△「東京之行」是一篇遊記文，此類文章雖然很多，但由王撫洲先生寫來，却是語意深長。諸如由具有盛唐遺風的日本飲宴方式，令人油然而興思古之幽情。由逛東京的中國文具店和中文古書舖，深知日人對中國文化感受之深與文物保存之豐。回頭看看我們自己，由於欣賞書籍文物者多無力購買，有購買財力的却又不欣賞書籍文物，所以今日臺灣文具書舖裡所擺設的，除了升學指導

，難題解釋之外，真正像樣而又有份量的東西確實難得一見，即就此點而論，能不發人深省。

△我國憲兵創始人，前甘肅貴州省主席谷正倫先生去世業已多年，然由於他的愛妻谷陳瑾女士對他生平事蹟動人的口述，不僅使人益知他們夫妻感情篤厚，生死不渝，歷久彌深；更藉着章君毅先生傳神之筆，使谷氏永遠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讀「我的丈夫

谷正倫」續文後，感於愛情之偉大，文辭之優美，能不令人為之讚賞歌頌。

△孫洵侯教授的「中外著名的保險巨子」一文，不僅供我們窺知歐美保險事業發展進況，進一步更供我們瞭解一個大企業家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要件。歐美大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不可否認的都是天之驕子，是能幹的人物；但是上天所賦予驕子的是最好的手、腦和心，不是最好的嘴、胃和其他；他們是大貢獻家，而不是大享受家。他們的公司資本雄厚，富可敵國，但比起個人享受來，却趕不上我們，這一點值得我國許多自認為大企業家的人予以檢討反省。

△易君左先生「永懷羅敦偉兄」一文，質樸真切，情意深厚，由日常瑣事之追憶，愈見生離死別之痛，是一篇感人最深的至情文字。